

何兆武先生访谈

今年是何兆武先生 90 寿诞。在初春三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《史学理论研究》杂志的几位同仁来到清华大学校园内何先生的寓所,请他漫谈治学和人生感悟。何先生身体状况很好,每天看报刊杂志。现将部分谈话内容用问答方式整理成文,以飨读者;同时亦欲借此文向这位学界前辈表达我们的敬意和祝福之情。

问:您当初为何选择从事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研究工作?我们该如何理解历史的规律性?历史有什么用?

何:主要是受二战的影响,身处那种环境下,想知道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,有没有什么规律?到现在也没弄明白。不过我想,应该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。历史的偶然性很大,如果慈禧太后早几年去世,比光绪早,情况可能会不同。自然科学也有这个问题,不能说到这儿就止步了。牛顿说,“我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”,爱因斯坦又踩在牛顿的肩膀上。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来说,历史本身没什么用,关键看你怎么用它。用是研究结果的利用,而不是作为研究前提的用。

问:您觉得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有哪些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?

何:我觉得我们国内研究史学理论的,重点没有放在知识论上。其实重点应放在这儿,而不是形而上学上。这是我个人的感觉。比如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什么?这是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东西。我们应该研究为什么它是推进历史的动力,这才是知识

论的问题。比如说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,过去往往将其看做前提,但没有回答为什么。比如说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,怎么来理解?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世界第一的,规模最大,时间最长,按说国家发展水平早就应该领先世界,可是没有。英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很少,可在 19 世纪的实力是世界第一,它是怎么变成当时超级大国的?应该首先解答这个问题。我解放前做学生时,问老师,为什么鸦片战争前中国历史总是循环?应该有个知识论的解释。老师的回答很简单,就是马尔萨斯的观点。人口多了之后,粮食不够吃了,于是社会出现混乱。战争屠杀后,人口少了,饭就够吃了。我觉得单单人口论的解释很难成立,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。

问: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循环现象,您怎么理解?

何: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。不过近代以来,中国与西方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没有科学。科学是第一生产力,但我们不讲科学,一直到解放后都有这个思潮。我们老是讲政治挂帅,没有听说科学挂帅,对科学非常之不重视。我们科学院是研究机构,应把重点放在科学研究上,可是我们经常需要下去,因为政治需要。总是用政治冲击科学。我们下乡时,领导老是说,要人在农村心在农村,就是说不要想城里的论文还没写完,怎么写。可是你知道,人要想做出点成绩来,必须要朝思暮想,不能放弃。曹雪芹写《红楼梦》,走路上都在想,想到好东西马上回家去写。你得急兹在兹。庄则栋是世界

冠军,要让他去劳动两年,他回来就拿不了冠军了。陈景润被批斗时一边斗一边笑。他在想数学公式,真正做研究就要这样。不应该三天打鱼,两天晒网。

问:做研究除了专心致志外,是不是还要注重交流?

何:是的,可是我们的学术交流也太少。过去我在历史所,没有看到什么国外的杂志。吴恩裕研究“红学”,有一回听说台湾中研院的一本杂志上有篇林语堂研究《红楼梦》的文章,请我帮他借。经过请示党委特批,我借到了杂志。可经过这个教训后,我绝对不再去借杂志了,看篇论文还要特批,变成特殊情况了,不是制造麻烦吗?历史所胡厚宣老看台湾中研院的杂志,后来变成罪状了。科学不能有界限。不看人家的东西,关起门来自己想,不等于自我封闭吗?

问:您怎么看待科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?

何:在研究中,过分的政治挂帅不行。科学研究就要科学挂帅,如讨论贪官清官,不能上来就有结论,得先有研究再有结论。过去我们科学研究中老讲政治挂帅,但总不能研究前先有结论,不能这么干。以前国庆游行时,“科学大军”中有个标语,“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。这个标语应该反过来,无产阶级政治必须服从科学。科学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,就看谁能掌握它。

问:自然科学中,这个问题比较好理解。在历史科学中,是不是关系比较复杂?

何:当然历史学本身具有二重性:一是科学性,二是政治性。我们传统的历史学是按政治学操作,所以历代都修前朝的历史,本朝的不好修。研究固然不能泄气,可是你也不能造假。以前说苏联米丘林、李森科的科学,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推翻了,现在也

承认造假。50年代我们生物学界也有这个问题。60年代朝鲜出了个科学家金凤汉,发现了“风汉小体”,说是生命的基本细胞,可以重新改写生物学的历史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好几版,后来发现也是造假。这些都是过分的政治挂帅。有人这么解释,说“兵不厌诈”,政治上有时需要造假。对敌人可以“兵不厌诈”,对自己的人民可不能“兵不厌诈”,要这样的话就丧失你的信用了,人民就丧失信心了。历史研究中,我们有两个标准,一个是政治,一个是科学,怎么结合,这是个问题。

问:民国时期这个情况怎样?

何:从北洋到国民党时期,政府管的比较松,并不是他们多么宽宏大度,而是顾不过来。政权不稳固,没有余力管。我上小学是北洋时期。我们学的口号是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。军阀不管,当时他们的兴趣只在抢地盘。童子军军歌中有一句是“哥哥华盛顿,弟弟拿破仑,”也没有余力管意识形态。后来开口三民主义,闭口三民主义,可实际上也没搞三民主义。

问:您如何看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?

何:历史研究总需要一种指导思想,但这种思想应时时刻刻受事实的修正。自然科学如此,历史科学也是如此,指导思想必须不断接受事实的修正。要不然怎么进步呢?科学总是不断进步的,不能把任何科学固定在一个点上,说永远不变了,俟之百世而不惑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哪有这样的科学呢?《圣经》一个字都不能改,那是宗教。人的认识总是在变化,思想也总是在变化。假如马克思今天活着,他该怎么说,他该怎么看?他是不是还与一百多年前持相同看法,恐怕应该有很多的改动的。环境和条件

变了,结论就应当有所改变。这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。

问:现在比较强调创新,您觉得史学该怎么创新?

何:其他各门科学对历史学应该有很大推动作用。比如心理史学,现在很少有人搞。可是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心理活动影响,如希特勒的心态肯定和我们不同,他想征服世界。各种学科的相互促进很重要。

问:您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候是在西南联大么?最困难的时候是何时?

何: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时候最快乐。那时虽然有轰炸,可是坚信不疑,战争一定会胜利,胜利后一定是美好的世界,一定过着美好的生活,挺乐观的。并没有根据,可能是青年人的特性,心态都挺好。现在虽然世界有很大的改进,也没有那么大的战争,可是并不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,没有这个信心了,这也挺奇怪的。

最困难的时候是“文革”。不光是个人,好像整个社会都没有前途。把孔府破坏了,是“文革”中一个大的破坏,很可惜,那都是几千年的东西。“文革”也是书籍的大灾。秦始皇烧过书,希特勒烧过书,“文革”也烧。“文革”十年根本不能读书,断了十年。没有经历“文革”十年,就不会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历史。

问:清华百年校庆,您参加了不少活动吧,请谈谈感受。

何:以前发过一个校友通讯录,我一看,有好几十个部级干部,清华培养了不少领导。过去大陆与台湾互称对方的清华大学为“伪清华大学”,现在讲两岸是一家。台湾清华大学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,我们的清华大学一个没有。我们运动搞得太多。我在历史所30年,做业务也就1/10的时间,不过三年,哪能出什么成果呢?我们对旧社会的研究重视不够,国民党的那套体制,包括中央委员会、特务组织等,是学苏联的,不是学英美的。孙中山改组国民党,就是以俄为师,说不以俄为师,断无成就。国民党学苏联以党治国,我以前上中学,每周军训后都喊口号,喊三民主义万岁、中华民国万岁、蒋委员长万岁,这些做法都是不科学的。

访谈最后,何先生特意谈到要保护年轻人的热情。他提到两件事,一是“五四时期”,火烧赵家楼事件后,一些学生被抓了起来,各方面名流去保释。最有趣的是,烧的是曹汝霖的房子,可曹汝霖也去保。二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,何先生的一个姐姐因参加游行被抓了起来。过几天,他的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信,信上说请你放心,我们会尽快地把她保出来。临别前,我们祝愿何先生健康长寿,他笑言,他更看重生命的质量。是啊!如何使生命有效?这是何先生给我们的思考题。

(张文涛整理,何兆武先生审阅)

(责任编辑:刘军)

(责任校对:景德祥)